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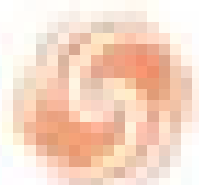
[世纪大讲堂]

Elite Forum

第7辑

著名讲坛 权威学者 民众话题





1991年10月

1991年10月



Elite Forum



第⑦輯

「世纪大讲堂」

著名讲坛 权威学者 民众话题
凤凰卫视强档栏目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凤凰卫视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纪大讲堂.第7辑/凤凰卫视编著. - 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205-05706-X

I. 世… II. 凤… 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②自然科学-文集 IV. Z4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8668 号

出版发行:辽宁人民出版社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印刷:沈阳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:151mm×227mm

印 张:23 $\frac{3}{4}$

字 数:380 千字

印 数:1~10,000

出版时间: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刘一秀

封面设计:曹小冬

版式设计:王珏菲

责任校对:侯俊华

定 价:38.00 元

销售热线:024-23284300

23284296

为意外的成功作序

——写在《世纪大讲堂》结集出书之日

凤凰卫视公司董事局主席



当我们决定创办《世纪大讲堂》节目时，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，我们找不到任何范本。也就是说，把学术直接搬上电视荧屏，尚无任何的成功先例。我们只是觉得，让现实世界了解学术思维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，我们多是尊崇实践大于尊崇理论，而理论指导生活发生的频率实在太少。我们重视的理论，多是对刚刚发生过的实践的仓促总结。而每一位走进过大学校门的人都知道，学院派理论绝不仅于此，它是丰富的，多元的，五彩斑斓的，引人入胜的，甚至它们之间也有着类似戏剧性的激烈冲突。假如我们把它搬上电视，至少是一部分读书人，可以离开书册之累，躺在舒适的床上，透过现代化电子传媒，了解深邃的理论世界。



于是，凤凰卫视同仁经过一番准备，于2001年元月推出《世纪大讲堂》栏目。

起初，我们只是觉得，把学术搬上电视，不管有没有人看，都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。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青睐，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，于是



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，多少带有几分悲壮。但是我们成功了，这使许多同行——包括许多凤凰卫视同仁——大吃一惊。

我们的实际观众群，也大大突破了原先预想的范畴，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海内外学子和那些具有一定知识积淀，而又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的观众。其间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，坐在自己家的沙发里，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免费享受一次大学教育，正在大学工作或学习的人，可以不经图书馆的烦琐手续，轻而易举地得知其他教授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动向和观点，而已经走出大学校门的人，可以旧梦重温，不出家门，便听到久违的恩师或新锐学者对国家和改革的谏言。

由于国际一流大师经常出现在节目中，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，《世纪大讲台》显得大气满城。名校名师相继得到公平展示，《世纪大讲台》也就变得内容磅礴，框架严密，百家争鸣。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，化淤节于瞬间，使得如此严肃的节目中有了会心的笑和毫不拘谨的交流。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，使《世纪大讲台》出人意料地在一个极不起眼儿的非黄金时间，迅速蹿升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。

到此为止，这个得到观众厚爱的节目，已经播出将近两年时间，该是做一个小结的时候了。所以，我们及时推出这部实录书籍，以慰关心我们、鼓励我们、给我们以好的建议的广大电视观众。在这篇简短的序言的最后，请允许我代表凤凰卫视同仁，说一声“谢谢”。有了大家的关爱，才有了这个电视学术节目出奇制胜的成功。

2004年5月

目 录

- 刘长乐 为意外的成功作序
——写在《世纪大讲堂》结集出书之日 / 1
- 王绍光 转型与治理 / 1
- 郑洞天 电影的文化定位 / 22
- 李 锐 语言的自觉——汉语写作的自信心 / 41
- 贺卫方 中国宪政之起步 / 60
- 陈坤耀 新经济年代的教育路向 / 80
- 萨尔文迪 人本科技与中国经济的振兴 / 98
- 袁建平 载人航天：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 / 116
- 宋笔锋 从飞机外型变化看飞机的百年发展 / 135
- 肖云儒 动感西部 / 158
- 何炼成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对策新探 / 178
- 何东全 中国城市交通——挑战与应对 / 194
- 姜澄宇 来自微观世界的精灵——微机电系统 / 217





李 楯 在中国，我们怎样面对 AIDS / 235

张维迎 大学的治理与改革 / 255

詹姆斯·赫克曼 人力资本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 / 292

弗农·史密斯 市场、资本市场与全球化 / 308

郑功成 民生问题与小康社会 / 320

康晓光 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 / 340

周国平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/ 359



提示语：

没有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，就不能实现长治久安，就不能实现民主与自由。

王绍光：

转型与治理

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王绍光



许戈辉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大家好，这里是《大红鹰·世纪大讲堂》，我是许戈辉。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主持这个节目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大讲堂里学到更多的知识，聆听到更多的声音，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，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一讲。

整整 25 年前，中国打开了封闭的大门，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。25 年过去了，不论是经济上的发展，还是政治上的进步，都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。不过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



也面临了种种的新问题，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条件，就是要先了解我们国家真实的国情，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这是必然的。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强烈呼吁，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保障的话，经济建设或者是民主进程的推进，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在这些强烈呼吁的声音当中，有一位格外的嘹亮，那就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。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历。

王绍光，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，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，之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，先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，尔后又在耶鲁大学教书育人十年整，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。

1993年，王绍光和著名学者胡鞍钢合著《中国国家能力报告》，这场报告推动了中国整个分税制的建设和分税制的改革，被国外媒体称作“王胡报告”。此后，王绍光与胡鞍钢合作撰写了1995年的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》、1999年的《中国：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》、2000年的《政府与市场》、2003年《第二次转型：国家制度建设》等著作。

1993年迄今，王绍光共出版著作二十余部，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。

许戈辉：王教授，您好。

王绍光：您好。

许戈辉：这样吧，我们先简单地聊一聊，做一个比较轻松的聊天。我先问问您，您是武汉人吗？我知道您最开始在武汉上学。

王绍光：原籍是山东，但是山东我只回去过两次，是在武汉长大，长到24岁。

许戈辉：在武汉长大，那您最喜欢吃的食品是辣的吗？



王绍光：我最喜欢吃的是带微辣，但不要是四川的，不要有麻辣。

许戈辉：我知道您在美国 18 年，吃得到可口的家乡菜吗？

王绍光：我自己做。

许戈辉：自己做，那您还是一个烹调好手。

王绍光：好手不算，反正能做到自己可口就行。

许戈辉：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

王绍光：宫保鸡丁吧。

许戈辉：还挺家常的。那我问您，您在耶鲁大学教了十年书，现在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，您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有什么不同？

王绍光：这么讲吧，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边，我觉得都是中上，中上上，比一般的美国学生质量要好。

许戈辉：我就听说过有我的同学到国外去留学，他们就告诉我一个特别好玩的事。他们说美国学生在每个学期开学，他们选修课程的时候，他会先到老师的名册上去找，他们只要看到有拼法是 Wang(王)或者是 Sheng(盛)、Liu(刘)，他们就绝对不选这门课，因为这门课里说明有中国的学生，或者是韩国的学生，那在这门课里面一定是那些学生领先，美国学生没戏，所以呢，就像您所说的。

王绍光：但是我说的中上，中上上。最好的，说实在的，也许我的观察还是不太全面，因为我都一般呆在美国差不多顶尖的学校，一般的学校可能不知道，最好的，说实在的，还不是中国的。

许戈辉：还不是？那是哪儿的？

王绍光：还是美国的。也许我工作还是社会科学，在理工科也许不一样，至少在社会科学这些领域，最好的还是美国学生，中国学生的普遍素质比美国的平均素质要高，但是最好的





还不是中国的。

许戈辉：那王教授我们就切入正题。王教授，我发现在您的著作里边，类型跨度非常大，涉及的范围很广。我们看看您著述的这些题目《理性与疯狂》、《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群众》、《挑战市场的神话》、《左脑的思考》、《政府与市场》，这个好像就是说，从不同的领域这样跳过来跳过去的，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？

王绍光：我这个研究有点像“地道战”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这是兴趣所在，我觉得这个事我有兴趣，我就会写，书名也许还反映不出来。我还写过人们怎么花费他的休闲时间，最近刚刚写的一篇是人们读书的品味，我在四个城市跟其他的学者做调查，人们读书的品味如何，写过中国的军费，写过信任的基础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写过。

许戈辉：您上学的时候难道您的老师没有告诉您一定要学有所专，学有所长吗？

王绍光：所以我就不是一个好学生，专不下来，我觉得要老专一样事的话，我就闷死了，我得不断变换新的话题。所以，我每次可能都做三到五个题，这个做得有点烦了，就做另外一个题，这样我觉得有兴趣，能保持我自己的兴趣。

许戈辉：据我了解您是在北京大学学的法律，后来就漂洋过海，然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，又在耶鲁大学教了十年书，中国问题或者叫中国的国情问题怎么成为您的研究课题的？

王绍光：这也是非常的巧合吧。我做的学士论文是《美国的利益集团》，在康奈尔做的硕士论文是《民国初年的政治》，写的是中国民国初年 1912 年、1913 年、1914 年的政治。

许戈辉：这些都还集中在您政治学的领域。

王绍光：博士论文写的是《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群众》，



我的博士论文据说在康奈尔大概是第二长，有 1000 多页。但是 1989 年论文写完以后，跟要工作之间有一年的时间，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。然后这时候，我的印象好像是当时我们经济系来了财政部的一个处长来读经济系，他就跟我讲了财政上的一些事，我觉得非常有兴趣，我就突然一下转到财政上，这样就开始写关于国家能力的一些问题。1991 年胡鞍钢已经在国内当时小有名气，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，我在一个聚会，一个 Party 上碰到他，然后就谈得非常投机。他在耶鲁呆了两年，我就跟他合作，他做国情的，他觉得我的写法，虽然在海外写的，也适合中国国情，这样我们就联起手来。刚才你念的好几本书，不是我一个人写的，很多都是跟胡鞍钢一块写的。

许戈辉：那是不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和了解，您现在发现制度建设是最为紧迫、最为重要的？

王绍光：对。这个制度建设今天我待会儿要讲的，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研究成果，胡鞍钢，还有一个叫周建明是上海社科院的学者，我们三个人牵头组织了大概 15 个人，这些人我认为是一流的学者，在国内或者在国外教书的，全是中国人，我们写了大概 30 多篇文章，我今天讲的是提取中间的一部分，大概是精华部分，来给大家介绍，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，是一个集体智慧的成果。

许戈辉：所以，大家想一想，那么多的著述，汲取最精华的一部分，而且是集体的智慧，将是非常精彩的。好，让我们用掌声请王教授给我们进行主题为《转型与治理》的演讲。

王绍光：很高兴有这个机会。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不多，分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叫做成就与挑战；第二个讲良治的基础。良治就是良好的治理的基础，现在国际上，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在讲良治的必要性，但是我们觉得讲必要性是重要的，但是还要讲良治是什么样一种制度性的基础；第三方面结合中国





的实际讲一讲，在中国进行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

第一个方面，成就与挑战。成就，其实不用多讲，我先给大家看一张表，你能看到中国的成就。这张表是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。两个算法，一个是1975年到2000年，一个是1990年到2000年。我们看到即使从1975年算起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还没结束，到2000年，中国的人均GDP或国内生产总值，年均增长是8%，高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。在国内我们经常会讲“四小龙”，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新加坡、韩国，讲它们的经济奇迹，其实我觉得在过去25年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才是真正的经济奇迹。中国是一个12亿人的大的经济体，能够在25年的时间里边，连续以这么高的速度，8%的速度增长，人类历史上空前，而且我还想加一句，也可能绝后，因为12亿人的国家也不多，印度今后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不知道，很可能是空前绝后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。所以成就，我就讲这么一张图，不多讲。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是，即使是成就也会带来挑战，我想讲在经济方面，在过去25年，中国发生了六方面的变化，这每一方面的变化全都是好事，但是我也会分析这每一方面的变化都会使政府治理这个国家，变得更加麻烦，具有挑战。

先讲经济方面的变化。第一个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。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经济是以农业为主，在经济学里边叫第一产业，逐步地向第二产业转移，就是工业，再往后是逐步地向第三产业转移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，农业以粮食为主，这个经济是不需要监管的，不需要太多的监管。但是一旦把它变成工业化就比较麻烦了，进入工业国家就开始要规定，比如说劳动条件要进行监督，产品的质量要加以规范，如果一到第三产业，中国目前就在尽量地发展第三产业，一旦到第三产业我们就会出现远距离贸易，什么叫远距离



贸易呢？不是面对面的贸易，不是像秀水街那样子，拿着计算机按一按就行了。它是远距离，我刚去过甘肃，可能是把甘肃的产品运到广东，运到香港，可能从甘肃到纽约的 Syracuse，我们不知道，它可能很远，人见不到面了，这时候就出现信息非常重要。同时，比如说金融、保险、咨询、保健这一系列第三产业的行业，它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信息的问题，就是信息出现一个叫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，什么叫信息不对称呢？就是交易的双方有一方面知道很多事，我知道我的产品好不好，我卖给你，你不一定知道，尤其是保险。举个例子，我的身体很不好，我要买你的保险，我买了以后我就病了，然后你就赔我，这就是信息不对称。像这些第三产业一发达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出来了。这个监管跟监管农业是非常不一样，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化就带来了治理的挑战。

再来看资源配置。改革以前是国家用计划来配置资源，就是说哪些东西应该到哪，钢铁生产以后发放到哪个厂家，哪个厂家然后再做什么事，都是国家分配。现在中国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市场，供求关系。管理系的同学可能了解更多一点，供求关系以市场来调节。那么到现在，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，当然跟有些国家比不了，但是跟比如说前苏联国家，很多转型国家，我们的市场化水平已经高于他们。那么市场化以后，市场会带来很多奇迹，但是往往也会引起人们对市场产生一种迷信。

实际上，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靠市场，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。1990年的时候，东欧国家刚刚开始进行转型，这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加尔·布雷斯，他去匈牙利讲演，他讲完了以后，底下匈牙利听众就说，怎么回事，教授您讲这么长，怎么没有提 Hayek，国内现在很时髦的海耶克这个名字，没有提其他几个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字？加尔·布雷斯回答就很简单，他说，他们期望的那种





完全市场来操纵的经济，历史上没存在过，将来也不会存在，如果存在的话，你们会痛苦不堪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经济必须有市场，但是不能由市场来垄断，还得有国家的监控。中国在过去吃计划经济的苦吃了不少，所以中国政府在了解政府失灵方面，中国的学者都有很深的体会，都有很多的教训，但是市场失灵怎么来调控，我们的经验并不足，怎么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，这也给国家的治理、管理经济带来挑战。



第三方面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。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私有制，所有制结构非常简单。但是到今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呈现非常大的多元化，有国有、有集体、有合作制、有三资企业、有私营企业、有个体户，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所有制，中国都有。当经济主要以国有为主的时候，它每个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，改革以前每个企业创造的利润交给上级，你缺钱了，上级拨钱给你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，他不用去管我的经营状况。但是现在的私营企业他一定要管这个东西，我能不能赚钱，我不能赚钱我干这活干吗？累死了。即使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它也变成独立的主体，政府想让它干什么事，它觉得这不赚钱，它会想方设法逃避，去做别的事。所以，所有制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所有的经济实体，都变成有很强的自主性，不会再听从国家的指挥棒来转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就要从改革以前的直接操控，你干什么，你从哪里进原材料，你卖到哪里，要变成间接的调控。

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，就是经济实体的数目剧增。我有一些简单数据，比如1978年的时候，全国只有人民公社53000个，生产大队69万个，生产小队482万个，那么农村就是这么400多万，不到500万个实体，比较容易控制。1983年公社一解散，中国的农村就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，数量的增加使管理就变得非常麻烦。另外一个更麻烦的是，改革以前如果有

一个实体，比如一个工厂，它 1950 年建的，到 1978 年这个工厂还在原地方，它的产、供、销、人、财、物这些东西都非常固定，那时候的人很少调动工作，你在这地方工作了，你就在这地方退休，你的孩子还顶替你，全都在那块。今天的实体完全不一样了，今天的实体今天成立了，明天衰败了，后天搬家了，然后就破产了，它的产、供、销、人、财、物这些所有的链条，时刻都在不断地变化，这就使你监控它们变得非常的麻烦。

再下面一个变化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。改革以前中国基本上是靠关着门的，对外贸易非常少，外资没有。那么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，你把进口加出口除以国内生产总值，是将近 40%，将近 40% 是什么概念呢？你把日本和美国算一个相应的数，它们可能就是 15%、16%，绝对不会超过 20%。换句话说，用这种方法计算的话，中国的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可能比这些国家还要高，当然这里边有些计算的技术问题，我就不去讲了。总之，在一个大国对贸易的依赖达到这么高的比例，世界上也没有。



再一个是外资。外资最高的时候是 1994 年，外资进来的钱相当于我们 GDP 的 6% 以上，这个你去找日本、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，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高的比重。有些人会讲四小龙依赖外资，其实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，四小龙经济发展中间除了新加坡比较依赖外资以外，其他都不太依赖外资，它们主要靠内部资本。那么依赖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治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上世纪 70 年代，出现了两次石油危机，把世界经济冲击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在中国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，在座的如果去问你们的父母，他们会对这两次石油危机，除了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以外，没有任何感觉，因为我们是封闭的，你爱怎么乱怎么乱，中国岿然不动。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，如果现在世界上再出现两次石油危